

对改进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断想

薛 克 诚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该直言不讳。从总体上说，我国不仅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方面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也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落后，从客观上讲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不发达；从主观上说则是由于封闭的体系和陈旧的研究方法所致。而封闭的体系与陈旧的研究方法又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者互为因果。

要改变陈旧的研究方法，提倡崭新的研究方法，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统一认识、更新观念之外，还有方法论本身的大量问题要解决。拙作只就方法论中的若干问题谈一点个人断想，以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人类社会是最高级、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它与宇宙间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既有质的一面，又有量的一面，因此一切社会现象也总是质与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现象时要把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每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无不体现了质与量的统一。社会生产力就有质与量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程度

和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后者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速度和规模。阶级也是质与量的统一，列宁曾给阶级下了个科学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在列宁的阶级定义中，第一句话是指阶级的量的规定性，阶级是由一定数量成员所构成的社会集团，后面两句话是指阶级的质的规定性；是否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是划分阶级的最本质的依据。唯物史观经常讲到的人民群众这个范畴，也是质与量的统一，质是指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社会势力，量是指居民中的大多数。甚至有别于社会实体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具有质与量两个方面，其质是指社会性质而言，即是属先进的、落后的还是反动的社会意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社会意识；量是指社会意识发展的速度和传播的广度。

可是，传统的唯物史观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往往侧重于定性的描述，而忽视了定量的分析，从而导致对同一社会现象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样说是对的，那样讲也是对的；难怪有人说唯物史观是“模糊史观”。这就很难正确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其重要的认识根源之一在于没有把阶级看成是质与量的统一，没有严格区分阶级与阶级残余，确切地说没有把握阶级的量的规定性，把阶级残余混同于整个阶级，因而当剥削阶级作为整个阶级已被消灭时，误认为剥削阶级还存在，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封建主义影响的认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其不同只在于对剥削阶级的量估计过高了，把剥削阶级残余与完整的剥削阶级混为一谈；而对封建主义影响的认识则是对封建主义还存在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量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严重性，因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作坚决的斗争。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往往是针对所谓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的。

如何正确地运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也同样存在着定性与定量的考察问题，尤其是离开了对生产力的定量考察，运用这条规律就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运用这条规律的结果，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运用这条规律的结果，今天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运用这条规律的结果。但在这里，很显然存在着正确运用与错误运用之分。农业合作化初期步子比较稳妥，生产关系的逐步改变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因此促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可是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特别是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则太快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在当时，毛泽东同志已觉察到这一点，曾指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并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即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或者实行停止发展，或者进行必要的收缩，或者允许适当的发展。所以会造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对生产力缺乏定量分析，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认识，这恐怕与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没有进行定量分析也是分不开的。为了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状况，防止重犯急于过渡的错误，完全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标准进行定量分析。

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必须把定性考察与定量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曾经指出，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恩格斯认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

方式。现在不少社会科学都在引入数学方法、定量方法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如史学就在日益与数学相结合，并出现了所谓数量史学。数量史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史学研究的新要求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用推测统计等一系列数学方法解释、透视历史事件，使叙述性的历史明显地转变为分析性的历史，从而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史学结构。80年代以来，协同学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定量社会学。这一学科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能够揭示出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能有效地揭示出社会经济发生质变时的条件和规律。在这方面，我国的学者、专家也作了可喜的尝试和努力。例如复旦大学统计系副教授李贤平以计算机中的模式识别法和统计学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红楼梦》中的47个虚字出现的频率及其差异进行分析，得出了该书的成因新说。江远平写的《水浒艺术探胜》其特色之一，就在于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一般认为《水浒》中缺乏风景描写，甚至断言《水浒》中找不到一段完整的景物描写。《探胜》作者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水浒》共有168处景物描写，不仅质量高，数量也大，不仅有三言两语的传神勾勒，而且还有完整详细的刻划。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较具有更多的随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社会现象更需要采用数学方法、统计方法。社会物质运动是离不开人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与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人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行动的，各个人的具体目的、欲望又往往是很不相同、变化无常的。列宁曾指出，自然界的统一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的“惊人的类似”中。社会领域更是如此。西德学者、协同学的创立者哈肯发现在全然不同的系统行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类似性。他采用了同样的数学模型来描述不同的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其中包

了人类社会物质运动这个大系统。数学家哥德尔曾提出了一个不完全定理，认为一个无矛盾的逻辑体系不可能是完备的；这可以说是人的认识规律的数学写照。1936年英国数学家图林就指出制造万能的、解决一切问题的计算机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为认识的无限性作出了数学的证明。由此可见，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引进数学方法，把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从定性到定量结合起来。

但是，企图把哲学数学化、唯物史观数学化，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真理有它的度，若把它夸大一步，即使是向前迈进一步，就会转化为谬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就是用数来解释一切，包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世界万物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是由数的比例所规定的，这样数就成了主宰万物的神。这种单纯用数去解释世间万事万物，既贫乏又不科学，说明此路不通。当然，不同的、具体的社会学科具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侧重于定性的分析，有的侧重于定量分析，但是决不能把这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只要定性分析，不要定量分析，或者只要定量分析，不要定性分析，都是不可取的，都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物质运动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唯物史观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尽管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科学，有的认为是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和以一般规律为指导的对社会进行改革的科学，也有的认为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但这些不同的说法，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唯物史观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

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

如何去揭示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呢？离开了对事物大量偶然性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是“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②。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对偶然性的揭示和研究，往往把偶然性看成是与宗教一样的东西，是科学的敌人。姑且不论宗教是科学的敌人这一命题能否成立，仅就把偶然性与必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排斥偶然性，贬低偶然性，这也显然是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它使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变成枯燥无味、千人一眼、万人一面的几个空洞结论。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对偶然性作用的研究有所重视。1987年在长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对清兵入关和清王朝建立是必然趋势还是偶然机遇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从皇太极几次南下绕明京而过及其表现出议和的迫切心情都说明当时清朝不具备统一的条件，清兵入关乃是诸种偶然因素促成的，不能认为清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至于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史学界还可进行深入的研讨，但它至少在突破不重视偶然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方面给人以启迪。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其规律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将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偶然性在起作用，大至社会形态的更替、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小至干部的选拔、个人的成长，无不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随机性。

拿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来说，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前者体现了必然性的一面，后者反映了偶然性的一面。其必然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8 卷，第 6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9 页。

表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向上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倒退、复辟则是暂时的、局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致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但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由于种种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其发展过程又都具有特殊性。有的民族和国家从原始社会瓦解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也有的民族和国家从奴隶社会直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的民族和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飞跃等等，这都说明了每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非要经过五种社会形态不可。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它的必然性，但也同样有它的偶然性与随机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切的数的方程式。”^①毛泽东也说：“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带所谓‘偶然性，。”^②如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产物。20世纪初，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反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在哪一天爆发，却带有偶然性与随机性。某个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拿破仑做了法国的军事独裁者，这是历史必然，因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一把“历史的宝剑”，需要有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人进行独裁统治，以扫除各种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然而历史不是一开始就注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页。

拿破仑要充当“历史的宝剑”这一角色的，起初资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朱伯尔将军身上，后来由于朱伯尔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于是拿破仑取而代之。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朱伯尔在战争中没有阵亡，拿破仑是不能充当这把“历史的宝剑”的，这就体现了偶然性的一面。

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远比制约自然发展的因素要多得多，复杂得多，因此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具有偶然性与随机性。据有的学者统计，制造肥料涉及的因素，其数量级为 10 ，生产缝纫机其数量级加一倍，即为 10^2 ，生产电视机 10^3 ，生产汽车 10^4 ，生产喷气式飞机 10^5 ，生产火箭 10^6 ，兴办教育事业为 10^7 ，建设城市为 10^8 。这说明了越是复杂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越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过去历史唯物论者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对其必然性的分析和把握，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忽视了对偶然性的揭示和分析；不重视偶然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难怪有人责难历史唯物论是“历史预成论”，这一责难虽有些言之过甚，但也不无道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

有人主张以非决定论来取代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认为传统的唯物史观是单线式的因果决定论，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论，不抛弃它就无法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的人却认为以非决定论取代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这是“离经叛道”，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究竟孰是孰非呢？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带有片面性，因而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唯物史观必定是体现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一元论与多元论的统一。

所谓决定论，据我的理解应包括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事物的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内，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规律所决定的，规律又是客观的，不能创造、不能消灭的，若否认了这一点，就会导致唯心论。第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它们的作用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其中有主要与次要之分，有决定与非决定之别。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有物质的因素，又有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归根结蒂物质的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第三，在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中，它们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其中必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事物的发展只起影响作用。拿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生产力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产生、发展和更替。

唯物史观关于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承认事物发展固有的规律性和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遵循其内在固有的规律的，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事物的矛盾总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总是绝对的、永久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②因此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及其发

①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展规律的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必须坚持决定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物相互作用的考察上。列宁说：“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普列汉诺夫在批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在环境与意见关系问题上的错误看法时曾指出：“在意见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无疑的互相作用。但是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互相作用上，因为互相作用远不能给我们解释社会现象。为着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意见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经历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讲的也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的原理。可见，只有承认唯物主义的決定论，才能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把历史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但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决定论的同时，并不排斥、否定非决定论，事实上决定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非决定论的原理，因为唯物史观从一元论的决定论出发，充分考虑到历史发展的辩证性和复杂性。非决定论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凡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对人类社会的發展都起着应起的作用，不起作用的因素是不存在的。有些因素在人类社会發展中的作用甚微，以至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愿谈及它们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真的绝对不起作用。恩格斯的关于社会发展“合力论”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个思想，认为任何人的意志决不等于零。第二，决定的东西与被决定的东西是相对于一定的考察系统而言的，在此一场合为决定的东西，在彼一场合转化为被决定的东西。例如前面提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通常的情况下，生产力、经济基础属于矛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2页。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页。

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的作用。但在特殊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则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决定的因素了。当然，这两者的决定作用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源性的决定作用，第一位的决定作用；后者是反作用的决定作用，是第二位的决定作用。第三，对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如实地得到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因而都是正确的。例如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考察，便有这样情形。从最终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对阶级社会来说，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历史的主体作用来说，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多元论的哲学基础在于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无法存在的。制约事物发展的往往是多因素，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多角度去考察事物，坚持决定论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多元论。不但某一事物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且其内部又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人类社会的结构也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座大厦，有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把它比喻为地质构造的历史，指出“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①。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人类社会的结构具有五个层次，即：1. 生产力；2. 经济关系；3. 政治制度；4. 人的心理；5. 思想体系。^②其实普列汉诺夫所讲的构成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层次，也还有它的复杂结构，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层次。总之，事物是复杂的，因此我们的头脑也需要复杂些，必须坚持多元论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5页。

能把握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可是有人认为既然唯物史观是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应该承认历史观的多元论，承认历史观的多元论势必导致历史唯心论。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未必能成立。第一，承认一元论并不等于坚持唯物论，这是因为既有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又有唯心主义的决定论，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是决定论。形形色色的唯心论都认为精神决定物质，精神是一切事物的本原。历史唯心论的失足，并不在于它坚持了多元论，承认精神和物质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于没有找出“动机背后的动因”，不懂得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第二，多元论与二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多元论是在承认事物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和具有复杂的结构的基础上，要求人们从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去分析事物，而并不认为同一个事物由多种互不相关的本原所构成，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要素对其发展的结果而言都存在着一个因果决定的关系。实际上，多元论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因果决定论，它丝毫不否认决定论，恰恰相反，是以决定论作为前提的。而二元论则不同，它把物质与精神看成是平行不悖的，都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原，谁也不决定谁，这样最终就会导致唯心论。

四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反对传统的静态地研究问题的方式，主张动态地、历史地研究科学的发展和变化，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不仅经历一个平稳积累的阶段，而且有飞跃突变的阶段。因而有人称他的学说为“理论动力学”。库恩的见解无疑有着合理之处，不仅对科研工作是如此，而且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也应

该如此。

把系统论的方法引入唯物史观，便要求动态地去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系统论的动态原则，要求研究系统发展变化的方向趋势，运动的速度和方式，还要揭示它的发展动力、原因和规律，改善系统的功能，着力提高其自我调节能力。所谓作动态研究，就是对人类社会作纵向考察，侧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每个社会形态的来龙去脉。具体说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当某种社会形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已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时，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发展的联系环节中去进行评价。恩格斯对奴隶社会的分析为我们作出了典范。奴隶社会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它创造了更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但奴隶社会毕竟是人类社会出现过程中出现的第一个阶级对抗社会，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对奴隶可以任意杀戳，奴隶成了奴隶主手中会说话的工具。奴隶社会与消灭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则有着天壤之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阶级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人类历史的史前史，真正人类社会历史的开端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当某种社会形态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确实还存在并在发展时，我们对它的认识不仅要了解它的过去、预示它的未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它的现在。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它与任何社会形态一样，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在它建立的初期，它在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不到一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今天，我们很难设想在历史上起过如此重大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仅在短短的几百年内便将要寿终正寝。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认识不足，过份夸大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未充分看到垄断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事实证明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余地，经济、技术和科学都在迅速地发展，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共存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学习和继承的一面。当然，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它迟早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是一个连绵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同时又是非连续的，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着质的相对稳定性。因此我们在考察人类社会规律时，除了需要进行动态研究外，还需要进行静态分析。所谓静态分析是指进行横向比较，这里最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比较：第一，从总体上比较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性，从而加深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属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比，较为明显地有以下几点区别：首先，社会规律具有主体性。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社会规律总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律说到底，就是支配人们行动的规律。自然规律则不然，它可以离开人的一切活动而盲目地起作用；人类出现之前，各种各样的自然规律就在起作用了。其次，社会规律具有易变性。规律的产生和作用总是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制约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条件相对于制约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而言要易变得多，因而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时间要比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时间短得多。如阶级

斗争的规律只有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价值规律只有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一旦阶级彻底消灭了，商品经济不存在了，那末制约它们起作用的阶级斗争规律、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而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然而在自然界却是另一种情况，如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规律等所起作用的时间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只要自然物体、生物有机体存在，它们就会起作用，这是因为制约这些规律起作用的条件是相对稳定的，是长期存在的。再次，社会发展具有加速度性。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科技是最强大的生产力，科技的发展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从而赋予社会发展规律也具有加速度性质。据有人统计，原始社会每万年生产力提高 1—2%，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每百年提高将近 4%，资本主义社会每年提高 3% 左右，社会主义社会每年提高百分之几到 10%；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更替也呈现出加速度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却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不如社会领域那样明显。

作横向比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与处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和国家进行比较，以便从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民族特色，走自己的路。马克思曾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列宁在谈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特点时，更为明确地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我国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在自觉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64—65 页。

的社会主义。

总之，人类社会与其他事物一样，既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又处在相对稳定之中，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要把握其本质和发展规律，必须把动态研究与静态考察结合起来。

五

有人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已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了，这种提法是否能成立，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重视对主体的研究无疑是当今哲学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趋势。

唯物史观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无疑地要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体进行研究，马克思曾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恩格斯也曾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总是竭力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归之于或神灵的启示，或绝对观念的外化，或少数英雄人物的创造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为了同各种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强调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没有忽视从主体方面去研究社会历史。

无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对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同上书，第537页。

主体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甚至把对有关人的问题，诸如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人性等等的研究，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难怪西方有些哲学家说什么：唯物史观不研究人，是人学空场。尽管这些言论未必正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弊端。

其实人的问题是唯物史观应有之义。唯物史观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就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的人们的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与社会是同步产生的，有了人才有社会，社会总是人的社会，马克思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 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哪一项能离开人？生产力，人是其中能动的要素；生产关系本身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制度都是由人们制定的，是为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而建立起来的；至于各种社会意识现象，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更是无法离开人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历史主体的作用，马克思称自己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主体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与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是不同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唯物史观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不仅应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还应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充分估计到主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把人不仅看成是自然的主体，而且也看成是社会的主体。马克思认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展开“主体”的丰富性，培养了“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